

柳詒徵與胡適

●柳會符

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，先祖柳翼謀先生詒徵回南京，復任龍蟠里國學圖書館館長，謀恢復舊館事，這時我隨祖父住南京，在中央大學附中讀書。凡為學莫若親其人，因此凡有學者來訪，祖父必命我隨侍。一九四六年十月，北大校長胡適之博士到南京參加國大會議，曾到龍蟠里訪問先祖，這天我放學回家，祖父對我說：胡適適來館，可惜你未見到。取視館中簽名本，胡適二字至秀逸，做黃山谷體，又是日先祖日記，有以下記載：

▲幼堂日記抄（一九四六年十月廿一日）：壬辰、執、晴。胡、董（作賓）、勞（幹）三君偕學生來，閱《水經注》，予至善本閱覽室招待。胡逐卷指示其假定之說，皆得趙氏原本之印證，意甚得，然讀濟瀛之潔字作驟音，殊可駭歎，大學校長以考證校勘自矜，乃讀別字，不亦差當世之士乎。午刻胡邀予至福州飯店午餐。予詢胡前此腿患，是否服黃芪而愈，胡謂迄今未能明言，以西醫有科學方法，而

不能斷定其為何證，殆非服黃芪之功，只係自行休息而愈耳。胡之腿患以中醫勸之服黃芪而愈，人所共知，而胡必諱言之，以中醫不足道也。」

一九四八年九月，中央研究院召開院士會議，胡適至南京開院士會，又至龍蟠里查閱全氏七校《水經注》，時我因病休學在圖書館養病，九月十九日上午胡適之先生與勞幹先生同來館中，祖父於陶風樓書庫樓下大廳接待，我正坐廳中習字，胡適身穿白綢長衫，駕金絲眼鏡，高鼻白面，風姿甚好，知我生病休學，拍拍我的肩膀說，你以後不要進學校，就跟着你祖父讀書好了。中午祖父帶我陪胡適到新街口安樂廳午餐，店中人認出胡適，捧出一本簽名冊，請他簽名，胡適忙請祖父先題字，然後在旁邊寫了胡適隨侍四字，勞幹又在後面寫了勞幹隨侍四字。

從以上可見胡適對祖父甚恭敬，相處很好，但二人治學觀點頗不一致。

潘伯鷹先生寫《柳翼謀丹鉛高寄》一文中以為先祖著《中國文化史》與胡氏有

關。

▲柳翼謀丹鉛高寄：「三十年前，那時胡適甚麼都不懂，却甚麼都談。章太炎把他教訓一頓，軼事猶在記憶之中。柳先生對於胡適的開口文化，閉口文化也是看不慣的。他雖然不教訓胡適，却不聲不響地寫了一部《中國文化史》，這部書在今天已經是老書了，但在當時使得青年人認識甚麼是中國文化，是有功的。」

但是先祖正式撰文和胡氏商量學術，却始於▲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一文。

一九一七年胡適之先生在北大講授中國哲學史，（胡先生時年二十七歲）只從春秋時代開端，而其前則略而不談。並著▲論子不出於王官論以證成其說，因之春秋戰國時代諸子之學說似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一般。由胡氏之創導，從疑古書之偽，終進而發展為顧頡剛先生之疑古。先祖之文暢論諸子之出於王官。在糾胡氏之偏而明中國學術之源遠流長。

胡氏學說，似重在強調證明，但其實亦不脫

劉逢祿、康有為公羊家學派之影響。好言古籍為後人偽造。但歷史終為明證，時至今日，地下古物出土日多，如大汶口之有陶文，殷墟甲骨之有四方風名，周原卜骨之刻八卦，類可證中國古來載籍之實大可徵信。

胡氏治學，強調客觀。

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：「清初的漢學家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來解古代經典有種種流弊，故漢學方法，只是用古訓，古音，古本等等的客觀的根據來求經典的原意。」

而祖父此文說他的議論並不純是客觀。

《論近人講諸子之學者之失》：「然諸氏（章太炎、梁啟超、胡適之）好稱客觀，而其論學則多偏於主觀，逞其意見，削足適履，往往創為莫須有之談，故入人罪……胡之論王官，直同歐洲中世教會黑暗殘酷之狀，不知何所據而云然。……胡氏論學之大病，在誣古而武斷，一心以為儒家託古改制，舉古書一概抹殺，故於《書》則斥為沒有信史的價值，於《易》則不言其來源，於《禮》則專指為儒家所作，獨信《詩經》為信史，而於《詩經》之文，又只取變風變雅以形容當時之黑暗腐敗，於風、雅，頌所言不黑暗不腐敗者，一概不述，蓋合於胡氏理想者，言之津津，不合於其理想者，不痛詆之，則諱言之。」

。此其著書立說之方法也。依此方法，故可斷定曰古無學術，古無學術，故王官無學術，王官無學術，故諸子之學決不出於王官。」

翼謀先生晚年有《我的自述》一文，記胡氏對他批評的反應。自承多少有點主觀：

《我的自述》：「我自幼受我母親的教誨，做詩做文不可好發牢騷，專說苦話，以及攻訐他人觸犯忌諱等等，所以平生謹守範圍，固不屑以詩文為干謁諛論之具，亦不敢用為玩世罵人之武器。自在東南大學與梅迪生（光迪）、吳雨僧（宓）等創辦《學術》雜誌，對於當時教育界、學術界加以評論。也止於籠統指摘，絕不許詆個人。又與學生繆鳳林、景昌極等創辦《史地學報》，《文哲學報》，亦止於平心靜氣討論學術，不立門戶，不爭意氣。有一篇《論近人講論諸子學者之失》（載一九二一年《史地學報》一卷一期）論及章太炎、梁任公、胡適之等詆毀孔子，崇拜墨子，及九流不出於王官等議論，措詞亦極慎重，懼嬰諸人之怒。這篇文章披露之後，太炎見了寫信給我，聲明從前詆毀孔子之誤，承我批評甚感。後來相見，甚為契合。寫一扇面贈我八字，是《劉歆傳》的：『博見疆識，過絕於人。』任公過

後對我的批評也無反響。一九二二年冬，任公到東南大學講學，對我很客氣。也曾寫一聯相贈：「受人以虛求是於實，所見者大獨為其難。」適之見面，也很客氣。我的學生乘間問適之對我的批評如何？他說：「講學問的人，多少總有點主觀。因為他提倡客觀，我說他的議論並不純是客觀也。」

觀此可知胡適及章太炎、梁啟超諸先生之雅量，至今瞬逾七十載，緬想前輩風流，不覺肅然起敬。際此中西、古今、南北文化相激蕩之時期，先祖與胡適在本世紀初，在學術上雖似分立不同之派別，胡適主白話文，先祖主孔子及中國文化，然相互制約、相互糾正，實亦相互促進，如今日歐美議會執政黨與反對黨，使中國文化去偽存真，存精華而去糟粕，使古今、中西之文化由相激相蕩而卒相合。學者於其間，但能虛心，實事求是，則自日後視之，其貢獻於世者亦必獨多。今胡氏之書俱已刊於世，先祖之文集及札記等尚未全出，一九九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捐重金刊《柳詒徵史學論文集》並《續集》共八十五萬言，雖非全貌，亦儘可供學者取閱，當可與胡氏書並勸其異同也。

一九九二年六月二日時在復旦大學中文系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

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